

全球化与帝国空间建构

——解读《橘子回归线》中的空间非正义

王 斐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以美国日裔作家山下凯伦的《橘子回归线》为文本范例, 借鉴已有和新兴的空间理论并结合“帝国”“全球主义”“跨国移动”等后殖民主义论述, 对文本中基于民族/国家的边界控制、种族/阶级的都市空间区隔而建构的非正义空间进行解读, 剖析了文本中美国统摄全球政治和经济脉络下的南北不平衡以及帝国内部基于种族/阶级区隔而致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空间再现, 揭示了美帝国权力意志所主导的全球化实质上与帝国权力形成共谋, 令帝国特权以及空间结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深入发展的真相, 从而质疑与挑战了全球化所标榜的“进步与共同繁荣”的神话。

[关键词] 帝国空间; 全球化; 《橘子回归线》; 空间非正义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1) 03-0086-08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生代美国日裔女作家山下凯伦 (Karen Yamashita, 1951—) 在美国文学界与学术界日益受到关注与肯定。尽管山下凯伦是一个具有日裔血统的作家, 但相对于亚裔前辈作家对族群历史创伤的描绘及亚裔美国主体建构的探索, 她的作品更多聚焦于多元族群的时空经验、跨族裔的合作结盟、全球化时代下的都市日常生活实践以及环境伦理等问题。

山下凯伦的《橘子回归线》(*Tropic of Orange*, 1997) 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书写策略, 透过后现代的情节铺陈, 讲述了一场由洛杉矶交通事故和北回归线由南向北移动所引起的时空异常事件中, 7个具有不同族裔背景的人物所经历的跨国越界以及都市漫游等空间实践, 质疑了以领土/民族国家为基准而界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边界所建构的非正义空间, 凸显了美国大都会洛杉矶的城市生态与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种族

和阶级不平等。

笔者试图从“空间非正义”的视角对《橘子回归线》中的主要人物所遭遇的非正义空间宰制进行解读, 剖析美帝国主义霸权如何在全球主义“进步”话语掩饰下, 促成南北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以及在国际都会洛杉矶内部生产与建构基于种族/阶级区隔的非正义空间, 进而挑战了美帝国霸权关于全球主义进步话语的主流论述。

二、全球化与帝国的非正义空间建构

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一如内格里 (Antonio Negri) 和迈哈尔特 (Michael Hardt) 合作撰写的《帝国》(*Empire*, 2000) 一书所述, 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新帝国, 首先通过经济与消费行为实现对“殖民宰制”地区的同质化^{[1]165-167}。具体而言, 美国在跨国经济中的新帝国体系, 利用全球性的经济产品与经济消费行为形成无所不在的新型帝国控制, 主要通过对全球经济脉络的统摄, 并以“全球化”

[收稿日期] 2020-07-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9YJC752029); 福建省教育厅教育科研项目 (社科) (JAS180186); 集美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 (C62004)

[作者简介] 王斐 (1981—), 女, 福建厦门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话语这一概念实现对世界的政治、经济空间的霸权宰制。从话语的维度进行考量，全球化即新型帝国掌控下的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过程，恰恰是在霸权意识形态操作下的、带有主观目的的“全球主义”话语生产过程，并最终型塑与巩固帝国霸权的政治空间。因此，全球化不只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话语问题。对此，后殖民主义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以将支持第一世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论述即全球主义理解为宏大叙事，其与帝国的延续直接联系，“全球主义是为全球金融化或全球化的利益而发明的表述。在歌颂全球化的话语中，伟大的发展叙事并未消亡……因为全球化有助于建构一个整体单一的、一体化的、符合第一世界利益的帝国”^{[2]331}。多伊尔（Michael Doyle）也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建立或保持帝国的政策和过程，全球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着维系与巩固着帝国。”^{[3]45-46}总而言之，帝国政治的权力意志构建了全球主义，全球主义定义下的经济扩张、跨国资本又成为帝国中心得以巩固的推力。帝国的意志决定了全球主义也催生了全球经济资本、文化的流动路径，与帝国权力形成共谋，令更多根深蒂固的帝国特权以及空间结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深入发展。

空间学者迪盖瑟（Mustafa Dikeç）在定义“非正义的空间性”（spatiality of injustice）时指出，由于正义具有空间性的特质，非正义也同样会在空间中被生产^{[4]1788}。空间的非正义又是以何种形式呈现与生产呢？美国社会政治学家艾利斯·扬（Iris Young）的答案是：存在于后现代社会中的“五副压迫式的面孔”——经济剥削、边缘化、权力剥夺、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扬揭露了宰制权力集团对空间的操控与占有而衍生了空间的非正义，具体表现为：贫困阶层生存空间的萎缩化，基于种族和性别话语形成的弱势群体空间的边缘化，空间上的文化歧视和暴力驱逐等^{[5]237}。

由以上论述观之，《橘子回归线》聚焦了全球语境下帝国政治空间中的非正义——南北半球发展不平衡以及帝国内部的阶级区隔、种族歧

视、贫富分化等问题，再现了空间隔离或国家边界管制的操控所导致的大规模的社会非正义。

三、南北不平衡的空间非正义

在跃升为世界霸主后，对于那些关乎帝国利益的遥远土地，美国不仅动用军事武力进行干涉或争夺，更是以隐蔽的手段，借经济全球化维系其作为全球资金、技术的提供者与管理的中心，将第三世界定位在下层劳力生产位阶的边缘地带而进行剥削。对此，维南特（Howard Winant）指出：“全球主义形成了一个种族化的社会结构……它是一种跨国社会分层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总部设在全球北部的公司和国家控制着全球南部。”^{[6]131}全球化下的南半球及北半球的劳力分工布局中，南半球充当原料、廉价劳工甚至人体器官供应者，而北半球则是资金来源、消费者和买家。这样的稳定供需关系，具有回应全球化帝国政治的意义，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凸显南北发展不平衡的非正义空间。小说中华裔男子阮鲍比（Bobby Ngu）和他墨西哥裔妻子拉菲娜（Rafaela Cortes）的个人离散经历以及奇卡纳吟游诗人阿坎吉尔（Arcangel）的见闻，就是美帝国主导的全球化市场操弄第三世界所引发的空间非正义的显例。

阮鲍比是一名华裔新加坡人，其父经营一家传统的自行车厂。然而，随着一家美国自行车公司在当地投资兴建了机械化生产新工厂并多支付了50美分的工资时，工人们“都到那里去了”；“很快，美国公司的产品畅销全球；鲍比家的工厂不能与美国公司竞争而倒闭”^{[7]18}。由于家道中落，年仅12岁的鲍比和他8岁的弟弟混入新加坡的越南难民集中营，期待移民美国开创新生活。于是，原名李关宇（Li Kwan Yu）的鲍比给自己改了越南姓氏阮（Ngu），谎称自己的父母在越南战争中身亡而作为越南难民来到美国。鲍比和其他越南孤儿被安排到拉美社区生活与学习。因此，阮鲍比这位来自新加坡却拥有越南名字的华裔，说着一口流利但又像“某种奇卡诺街头闲谈”的英语，却又住在洛杉矶的韩国城^{[7]18}。可以说，鲍比的离散经历和杂糅性的身份彰显了全球化情境下一种新移/难民的类别。

他们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失去了故土家园,同时为了求生背弃他的族裔背景与文化本源,失去了表明自己身份的姓氏,其文化和记忆更是被宰制文化所收编。他的跨国经历反映了索亚(Edward Soja)所定义的“全球非正义”即“财富的再分配由穷国流向富国,从边缘地区流向核心地区”^{[8]58}。美国运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地垄断资源,以创造一个一体化的、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这种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意味着全球空间在帝国意志的支配下被重新规划。也就是说,第三世界的空间被来自第一世界的产业所占领,资本将第三世界的人民从具有家园意义的土地驱逐,迫使其背井离乡,离开原本生活的社会空间,进入城市乃至跨国进入帝国成为廉价劳动力,挣扎在都市的边缘。

内格里和哈尔特认为,“帝国”不只有有效管理全世界的人口与地域,还创造了新的世界秩序,不仅是以规范来控制人口流动的程序,而且还将人类的本质加以收编与普遍化^{[1]6-8}。鲍比的墨西哥裔妻子拉菲娜的家族及其个体经历,也体现了美帝国以经济全球化宰制第三世界,将当地经济与文化同质化、普遍化的操作。拉菲娜父亲的家族是墨西哥库里坎(Culiacán)当地有名的传统织布机制造者,母亲家族则从事手工织布行业。在阿兹特克文化遗产中,编织是一门技艺精湛的手工艺,“它发展得如此之好,人们甚至可以通过编织来交谈”,但是“突然一天织布机停止了运转,因为织布机过时了”^{[7]8}。于是,代表墨西哥文明的阿兹特克传统织造业在美国资本和现代机器生产制衣业的冲击下解体破产。为了生存,拉菲娜和大多数失去家园的墨西哥农民一样因全球化,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而流离失所。而他们大多数人的命运就是“会涌入城市,去墨西哥城,去北方的马奎拉多拉,或者如果他们能越过边境到达加利福尼亚并不被驱赶的话,他们会去洛杉矶”^[9]。小说中对美墨边境的管控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是由现代技术和军事力量控制的,以对付来自南方的“非法移民”。加州警方划定的边界涵盖了“方圆14英里的区域”“终日探照灯火通明”。即使他们设法越过边界,也可能无法到达美国,因为“每晚会有1000多个越境者被捕”,如果

你幸运的话,边境巡逻队会追捕你,把你放进马车里,然后把你扔回墨西哥去。但不走运的话,也许会被击毙”^{[7]203}。小说中美国对墨西哥跨境移民的严控表明,尽管美国利用全球化以及跨国经济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越了领土边界,以资本流通、经济的操控实现对第三世界的宰制;但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Nation-state borders)并没有被全球化所消除,与墨西哥的边界依旧存在,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对此,布朗(Wendy Brown)在其《筑墙的国家,削弱的主权》(*Walled States, Waning Sovereignty*)一书中指出,全球主义有其悖论和非正义:一方面,全球化要求人员、资本和商品的流动自由化;另一方面,边境管控的加强充当保护边界和主权的一道新墙^{[10]203}。换言之,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时代,美国通过资本流动破坏传统的国家边界来进行统御世界、涵纳人口,但依旧运用民族国家的国境边界,实现维系经济政治不平等的空间区隔:通过军事管控的实体边界安全,形成对帝国主权的象征性维系,同时压制了边界重组和墨西哥人向美国跨境流动的可能,显示了流动的单向性和帝国主义性质。

小说同时也揭露了美国控制的边境流动的双重标准,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空间上存在的非正义性。身处美国本土境内的美国公民,充分享受着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可以不受国界限制、自由流动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并把自己特权享有的流动性和消费合理化。小说中凸显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导致的非正义的例子就是美墨边境,其一面是阻隔非法移民的铜墙铁壁,另一面却是巩固美国利益的生命线。当拉菲娜和其他非法移民被阻挡在美墨边境之外甚至面临着被击毙的风险时,来自墨西哥的人体器官却能越过边境,顺利流入美国大医院去“挽救美国公民的生命”。在越境的历险中,妇女或者不会说英语的偷渡者往往险象环生:“在边境沿线的那些地方,女人如果不被强奸,她就不能顺利离开”“不懂英语,不知道行话的墨西哥人很可能被‘边境老鼠’抢劫”^{[7]202}。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控制美墨人口流动方面采取了不合理和不公正的阶级歧视政策,如墨西哥的中上阶层、商界人士、具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等社会精英,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小

说中，在洛杉矶工作的墨西哥记者巴尔博亚（Gabriel Balboa）可以自由地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来回。当他在位于北回归线的墨西哥马萨特兰地区（Mazatlán）买下一块地建造度假屋的时候，“拉菲娜却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穿越北部边境”^{[7]6}。可以说，美墨边界不仅是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进行空间区隔的界限，更是一个展示了资本主义在跨国背景下对移民、劳工和有色人种妇女剥削加剧的非正义空间。

小说中另外一个自南向北跨越边界的奇卡纳吟游诗人阿坎吉尔，其在沿途的见闻揭露了标榜着“共同繁荣”的全球化的另一面。阿坎吉尔所逾越的墨美边境的路线实则为向美国源源不断输送资源却戕害拉美利益的运输路线，使拉美成为一个充斥着毒品走私、暴力犯罪、资源流失的非正义空间。在去洛杉矶的北上旅途中，阿坎吉尔在边境附近一家名为“苦难与饥饿”（La Cantina de Miseria y Hambre）的酒馆里吃午餐时，发现墨西哥啤酒已经消失了，只能买到美国啤酒。他看到酒吧里“所有饥饿而痛苦的人”都在“吃着汉堡包、煎蛋饼、番茄酱，喝着美国啤酒”。他是唯一一个要求烹饪墨西哥传统菜肴“仙人掌叶子”的顾客^{[7]131}。墨西哥餐厅里美国快餐和美国商品无所不在。服务员和食客所体现的对美国快餐的绝对认同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主导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美国资本跨国化的同时，却导致了墨西哥贸易赤字、比索贬值以及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大多数墨西哥人也为此生活在贫困之中，遭受着“苦难与饥饿”。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助力下，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可以携手合作，增进彼此的利益、加速资本扩张。与此同时，代表墨西哥文化的传统食品和饮料却从墨西哥餐桌上被淘汰了。进而言之，美国文化和价值观渗透于墨西哥人的日常生活中，侵蚀了墨西哥民族的主体性，无形中把南半球变成了美帝国的一部分，帝国的影响也无远弗届。

阿坎吉尔在一路向北的旅行中逐渐发现，全球化名义下的帝国宰制对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影

响在范围和深度上持续扩大。拉丁美洲所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的革命传统”不过是帝国宰制下开出的“恶之花”。例如，他发现墨西哥瓦匠罗德里格斯（Rodriguez）最小的儿子逃跑去当兵，但最终在对抗政府军的游击战中“死于伏击”^{[7]144}。他的死让阿坎吉尔想起了许多阵亡的士兵，而其中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对这些年轻人以“革命”“自由”的名义卷入派系冲突却丧生的悲惨命运，阿坎吉尔在其即兴诗歌的吟诵中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拉美是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受害者。这些意识形态往往是美国插手拉美各国政治的理由，进而导致该地区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此外，拉美的一些政客、革命领袖或独裁者为了满足他们对权力的理想主义或物质主义的欲望，用“革命/非法起义/政变/共产主义接管/私营部门国有化”以及“文化同化/发展和进步”^①这类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迷惑、煽动无辜的民众^{[7]143}，使拉美成为一个充斥着动荡与贫穷的非正义空间，同时助长了像美国这样的（新）殖民大国/帝国对拉丁美洲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

当他接近美国南部的边界时，阿坎吉尔看到美墨两国之间那道“穿过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德克萨斯，一直延伸到毗邻太平洋的提华纳，长达2 000英里的边界”^{[7]198-199}。事实上，这条漫长的美墨边境线是根据墨美战争后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重新绘制的。在重新划定的国家空间中，原来在此地的合法墨西哥居民却瞬间成为这块土地的非法定居者。这条国境线使他们首先失去了这片土地以及土地蕴含的资源，剥夺了他们的经济发展权。而为了维持生计，墨西哥人冒着生命危险越过边境，结果往往被贩卖、监禁、突袭、驱逐出境、强奸、绑架或干脆被处死^{[7]201-202}。阿坎吉尔的所见所闻凸显了全球化语境下美墨边境的空间非正义。

四、帝国都市中的空间非正义

梅西（Doreen Massey）认为全球化导致了

① 此句话援引自小说中阿坎吉尔的即兴诗歌，在小说中，为了突出阿坎吉尔的政治即兴诗歌，山下凯伦均以斜体字表示，因此论文中对原文诗歌的摘引也保留斜体字结构。

一种以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为表征的全球性空间重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日益加大,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本土经济和文化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贫富差距拉大。“全球贸易催生与创造出墨西哥城贫民窟这样新的空间。相较之下,那些已经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权力空间中拥有更多权力和财富的人,则将自己隔离在高墙森严又舒适的堡垒中”^{[11]119}。全球化时代中的美国全球都市(global city),可以视为彰显帝国意识形态的非正义空间再现,其不仅是“一个实现全球经济活动一体化的空间与组织”,更是一个重组了“城市社会经济秩序”的场域^{[12]3-4}。都市空间研究学者戴维斯(Mike Davis)在研究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全球城市景观时,认为洛杉矶是一个嵌入了由权力产生的相互联系的社会空间,在不公正的城市区域规划、各类资源分配的“城市重组进程”中,少数族裔劳工、工薪阶层和流浪汉是全球经济中的受害者或者被遗忘的他者,其权利被忽视^{[13]126}。《橘子回归线》中的全球都市洛杉矶作为“帝国”(第一世界)大都市的显例,充分凸显了中心/边缘、先进/落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的非正义空间,更是经由身居其中的人物所遭遇的不公不义被暴露出来。

正如西瓦(Vandana Shiva)所揭示的,全球化是“一个有计划的排斥项目,将南方贫困人口、资源吸进全球市场,剥夺他们的生命支持系统、生计和生活方式”^{[14]97}。鲍比离开了被美国跨国资本拖垮的在地经济体,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统御中心的美国都市,成为继续为拖垮南半球的经济制度服务的底层劳工。但吊诡的是,即使他和妻子能有幸抵达洛杉矶,却依然被排斥在帝国都市空间的边缘地带,无法享受全球化经济带来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鲍比和妻子居住的韩国城是洛杉矶中南部一个贫穷、犯罪率极高的社区,也是来自第三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多种族移民聚集区。这个处于洛杉矶边缘的韩国城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移民劳工在帝国中心所遭遇的不公不义。居住在社区的少数族裔很容易受到种族歧视和贫困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影响。政府经常对疑似“非法移民”家庭进行突然搜查,这导致了移民家庭的破碎:“每次有搜查发生,家庭随之支离破碎。有的父母被驱逐到边境,而

孩子们则被留下。婴儿们为无法回到母亲身边而嚎啕大哭”。在1992年的骚乱中,鲍比的墨韩混血裔邻居西莉亚(Celia Oh)父亲的照相馆被烧毁,她的哥哥则被枪杀,鲍比在街上发现了她,然后把尸体拖回了西莉亚家^{[7]87}。通过描述这些少数族裔移民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们在洛杉矶的社区,小说展现了在经济全球化重塑的国家空间和城市地理中,基于种族/阶级进行区隔的非正义空间存在的事实。

鲍比和韩国城中的无数移民一样,从事着低报酬并被贬低的工作。他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却有助于确保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维持着城里富有阶层的生活方式。白天,他在“一家大报社”的收发室里不停地分拣邮件;晚上,他和妻子为自己开设的清洁公司加班加点,负责繁华市区的办公大楼的保洁工作,如倾倒被撕碎的东西、擦拭小便池和拖地。两人工作结束后再回到破败肮脏、狭窄逼仄的韩国城^{[7]78}。他们夜间进入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清洁打扫,第二天上班的精英们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工作,享受着鲍比他们的劳动成果,却毫无觉察他们存在过的印记。正如拉菲娜所认为的,尽管她和鲍比拥有了自己的清洁公司,看似获得了某种经济上的成功,但是依旧无法跨越种族和阶级的区隔,因为“没有人尊重我们的工作”^{[7]80}。可以说,在全球主义中关于“进步”“发展”话语仅仅属于第一世界中的政治经济的精英们,他们在洛杉矶这个全球都会中占据中心位置;而鲍比和拉菲娜却被隔绝在外而身处边缘。他们犹如这个大都市中的隐形人,而这是廉价移民劳动力本质的一个体现。这样无休止的低薪工作抹煞了鲍比的主体性,令其变成了一台运转不停、毫无情感的工作机器,并且常年生活在一种焦虑之中:他恐惧自己的非法移民身份被起诉,所有的经济成就就会被剥夺,他的家庭福利将受到威胁。鲍比抑制恐惧的唯一方法就是物质消费,于是不停地用自己工作换来的报酬购买电器、小玩意和家具消解恐慌,并认为这是给家人提供最好的物质生活的途径^{[7]17}。鲍比毫无理想抱负,仅仅为了工作和消费而苟且生活。他甚至劝阻和嘲笑拉菲娜不断增长的政治意识,面对移民遭遇的不公不义则采取了忍辱负重的态度^{[7]80}。鲍比彻底认同美国价

值,认为“生活在美国是一大幸事,美国拯救了他。新的国家,新的生活。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实现一切,做一个纯粹的美国人”^{[7]159}。由此可见,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的劳动力已成为被消耗的对象,他们不仅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甚至深陷美帝国预设的消费主义陷阱,最终被商品消费逻辑所挟持。他们生命的内在意义沦落为无止尽的生产与消费,即他们用血汗获得的微薄报酬去消费,进而继续供养这个剥削压榨他们的经济政治体制,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令自己永远处于被剥削、被压制的状况,在这个号称全球都市的空间里依旧被隔绝化与边缘化。

作为一个表征全球主义的都市空间,洛杉矶呈现了美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信息革命的中心硅谷、世界影视娱乐之都的好莱坞皆居于此,同时洛杉矶赶超纽约成为美国拥有少数族裔人口最多的大都会,似乎彰显了全球主义话语下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但正如戴维斯所指出的,洛杉矶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其双重性——是一个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所在^{[15]15}。作为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洛杉矶是一个非正义空间的再现,小说通过都市漫游者非裔退伍老兵巴兹沃(Buzzworm)的都市行走与凝视,以其对洛杉矶的空间体验打破了全球主义的乌托邦神话,揭示了宰制权力机制以对都市空间的生产与控制,继续维持着剥削压制外来移民劳工以及排斥与区隔本国低收入阶层、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非正义空间。巴兹沃出生和长大的地方靠近杰斐逊区和诺曼底区,距离洛杉矶不远,是一个以经济贫困、族裔和种族多样性为特征的消极空间。他从小目睹洛杉矶中南部这块地区的地理和人口变化以及该地区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的非正义问题。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巴兹沃“从来没有注意到树的存在”——“他所在的街区没有树、灌木丛,到处是干涸的草坪、杂草、沥青和混凝土。城市的这一头是没有树荫存在的……穷人无法享受树荫带来的清凉而只好搭建门廊”^{[7]31-32}。除了居住环境的简陋,这块街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和洛杉矶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格格不入,这是一块被遗忘的社区,“那里没有树木,没有鲜花,也没有大型超市、百货公司、药房、医疗和牙科诊所、医院、银行、工厂

和工业”^{[7]176}。这里充分体现了索亚所言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差异性地理”(Distributional inequalities and discriminatory geographies),即公共机构的无能、种族偏见、预算要求以及存在差异的财富和社会力量等因素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空间非正义^{[16]47}。巴兹沃每天游走在洛杉矶内城街区,与那些被边缘化的、不计其数的无家可归者群体打交道,为其提供医疗、住房和法律援助。巴兹沃的观察反映了洛杉矶不同阶层、社群的巨大差异,进而挑战了洛杉矶作为一个全球都市所试图标榜的“进步、发展、多元与包容”的话语。

巴兹沃的行走形成了一种与这个全球主义构建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相抵牾的反话语,揭示了全球化场景的另一面。都市空间学者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曾提到:“边界能够定义一个人在城市空间的位置,并进而定义其身份。”^{[17]69}巴兹沃发现了身处都市边缘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空間图圖,每个人都被安插在被规划界限的空间里,他们在都会中的身份有时候是隐形的——“如果他一旦越过那条不可见的界限,他就会陷入麻烦、会被逮捕、扔到监狱乃至丢了性命。如果他退居这个界限之外,则变成一个不可见的人。但不管如何,他都没有好下场”^{[7]217}。

洛杉矶的弱势群体不仅被拘禁在规划好的贫民窟,而且无法享受洛杉矶这个全球都市中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freeway)所带来的行动自由。正如梅西所指出的:“无论如何,流动性对于不同的社会人群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有些人对流动性拥有更多的主导权,有些人甚至能够发起流动和移动;而有些人则不能,他们更处于被动接收的一端,故明显地受困于此。”^{[9]113}为了应对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以及维持宰制权力阶层的利益,洛杉矶政府在规划高速公路网建设的过程中进行了重新的空间规划。在这个由宰制权力、城市规划师所构想的空间里,低收入和有色人种的社区遭到了破坏——他们原先居住的住宅或经营的商店被政府拆除,让位给新建的高速公路。在小说中,政府官员向居民们解释拓宽高速公路的规划时,一位老年妇女站了起来,质疑政府的总体规划:“也许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高速公路,谁来保障她在这个整体规划下有地方可住?”^{[7]82}

果然“当高速公路真的拓宽以后,人们会忘记他们的承诺”^{[7]82},这些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族裔聚集的社区,被隔绝于相应的机构和商业之外;原先稳定的群体因为住房的拆迁或者破败而分裂,安身立命的家园一去不复返,最后“充斥着无家可归的人、毒品贩子和妓女”^{[7]83}。他们沦为城市发展中被淘汰的人,是城市非正义的受害者。可以说,从宰制阶层的视角观之,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体系隐喻不断前进、流通进行的经济脉动,是一个表征着进步、文明、共享的全球话语之空间再现;但对于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族裔而言,则是一个被区隔、被压制的非正义空间。

此外,巴兹沃发现,被官方认定为暴力犯罪猖獗的黑帮领地,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士绅化(gentrification)总体规划的产物^{[7]83}。所谓的士绅化项目原本是洛杉矶政府试图对老旧城区的内城进行改建,吸引中产阶级入住,满足中上层阶层的消费需求,从而提升洛杉矶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品位。但实际结果却是,曾经贫困的工人阶级的家园被崭新的地标性建筑所取代,如洛城文化中心多萝西·钱德勒音乐厅(Dorothy Chandler Pavilion)、金碧辉煌的联合车站(Union Station)、美国银行大厦(the Bank of America)、阿科双子塔(Arco Towers)。这些提升洛杉矶作为全球性都市的规划和建筑虽然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繁荣,甚至抬高了房地产的价值,却迫使不堪重负的社会底层居民离开家园,甚至变得无家可归。

正如索亚所批判的:“全球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多层次交互关系,构建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空间非正义……不管是市场机制或者市政府政策,穷国的基本需要几乎被忽略,小到都市街区大到国家层面,都是尽力满足最富有与最有权势的阶层的消费需求。而这些巨大的消费需求并不迫切”^{[8]58}。换言之,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在权贵阶层占据的空间和场所,形成了本质上不公正的地域布局,体现了财富与权力的空间分配不平均。因此,全球化情境下的洛杉矶城市景观变迁并非是关于“交流、进步和繁荣”的宏大叙事的显证。相反,它揭示了城市重建规划是如何服从于权势富有阶层,划定各种边界,将弱势群体从市中心净化排斥,进而造就贫困和无家可归的

社会不公不义。它暴露了城市空间分配上的不平等,进而继续产生和维持不平等的非正义性。

五、结 语

《橘子回归线》经由华裔阮鲍比、墨西哥裔妻子拉菲娜的漂泊离散和被殖民剥削的经历,吟游诗人阿坎吉尔的跨国经历以及以非裔流浪汉巴兹沃为代表的洛杉矶贫困群体所遭遇的空间暴力,揭示了美国帝国空间的非正义性。该空间的非正义性主要体现为:在帝国外部,运用民族国家的国境边界维系经济政治不平等的空间区隔,即在美墨边境对移民、劳工和有色人种的驱逐、限制流动自由以及以跨国资本操控第三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在帝国内部,空间的非正义性则体现为洛杉矶都市空间规划中对少数族裔、贫困人口的空间区隔与限定,剥夺其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和文化繁荣的权利。总而言之,该小说通过再现帝国主义霸权在全球范围以及帝国内部的洛杉矶所生产与建构的种种非正义空间,揭露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不平等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无法拥有相同的主体立场的事实,凸显了与经济全球化交织在一起而导致的社会不公,进而明确地质疑了在“共同繁荣”和进步话语包装下的全球化的虚假性。

[参考文献]

- [1] ANTONIO NEGRI, MICHAEL HARTD. Empire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GAYATRI CHAVORTY SPIVAK. Cultural talks in the hot peace: Revisiting the global village [C] // PHENG CHEAH, BRUCE ROBBINS.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3] MICHAEL DOYLE. Empire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4] MIKE DIKES. Justic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01, 33 (1): 1785 - 1805.
- [5] 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Press, 1990.
- [6] HOWARD WINANT. The new politics of race: Globalism, difference, justice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 [7] KAREN TEI YAMASHITA. Tropic of orange [M]. Minneapolis: Coffee House Press, 1997.
- [8] EDWARD W SOJA.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 [9] DOREEN MASSE. Space/power, identity/difference: tensions in the city [C] // ANDY MERRYFIRLD, ERIC SWYNGEONDOUW. The urbanization of injus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0] WENDY BROWN. Walled states, waning sovereignty [M]. New York: Zone Books, 2010.
- [11] DOREEN MASSEY. Politicising space and place [J].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996, 112 (2): 117 – 123.
- [12] SA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3] MIKE DAVIS. Magical Urbanism: latinos reinvent the U. S. City [M]. London: Verso, 2000.
- [14] VANDANA SHIVA. War against nature and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C] // SARAH ANDERSON. Views from the south: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WTO on third world countries. Oakland, CA: Food First Books, 2000: 91 – 125.
- [15] 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M]. New York: Vintage, 1992.
- [16] EDWARD W SOJA.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minneapolis [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 [17] DEBORH STEVENSON. Cities and urban cultures [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Space: A Reading of Spatial Injustice in *Tropic of Orange*

WANG F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By drawing on established and emergent theories about space, as well as insights from the postcolonial discourses of “empire”, “globalism”, “transnational mobility”,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spatial injustice constructed by the boundary control based on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race/class in Japanese American writer Karen Yamashita’s *Tropic of Orange*. The paper analyzes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which are embodied through the North-South imbalance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 as well as the social injustice of the rich-poor polarization caused by race/class division within the empire, thereby revealing the fact that the 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ctually forms a conspiracy with imperial power which consolidates its imperial privilege and spatial advantage, and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progress and common prosperity claimed by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imperial space; globalization; *Tropic of Orange*; spatial injustice

(责任编辑 陈蒙腰)